

【语言学】

共同体构建视域下“共情修辞”的目标、问题、路径

——兼论“元主体”“他者意识”“话语权补偿”概念

胡范铸 张虹倩 胡亦名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社会化最伟大的愿景和实践。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媒介，推进共同体的构建更离不开语言。这里的“语言”不仅意味着一种符号体系，更意味着一种修辞行为，一种“共情修辞”。依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修辞不仅意味着“表达”，还包括“接受”，共情修辞应该具备自觉的“倾听”意识；修辞不仅意味着“你/我”的对话，更是“我/你/他”三方的情感感知和响应，共情修辞应该具备自觉的“他者”意识；修辞不仅意味着话语权的实现，还包括“话语权补偿”机制，共情修辞应该自觉走出“丛林思维”。进而言之，共情不仅是修辞的动力，也是修辞的一套行动方案，更是修辞的根本目标，对于国家形象修辞而言，更是达成“共同体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共情修辞；新言语行为分析；元主体；他者意识；话语权补偿；共同体化

【作者简介】胡范铸，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修辞学、社会语言学、政治传播语言学、学术思想史（上海 200062）；张虹倩，女，浙江温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市晨光学者，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上海 200062）；胡亦名，男，上海人，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学院副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区域国别研究、国家形象修辞学（上海 200093）。

【原文出处】《外国语》（沪），2022.6.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19JZD02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日韩中小学教科书中的世界图景和中国形象”（2022EXW003）。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社会化最伟大的愿景和实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媒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离不开语言。这里的“语言”不仅意味着一种符号体系，更意味着一种言语行为。作为言语行为，语言何以促进而非阻碍共同体建设？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共同体”，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言语行为”，基于“共同体构建”的言语行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1. 从一首著名歌曲的接受史说起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过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龙的传人》，由侯德健创作于1978年，并由李建复演唱，新格唱片录制，当年12月推出。1990年1月，又收入了侯德健自己演唱的专辑《下去不》。1983年，这首歌曲经过歌手张明敏重新演绎后，立刻火遍全国。以至于有人将之视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族歌’”（爱地人2009）。2009年5月，《龙的传人》被选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十部委组织开展的“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百首爱国歌曲（璩静2009）。

不过，在这首歌曲风行大陆十年后，著名作家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介绍了一次与澳大利亚某汉学家的对话：“他听到歌词里高唱：‘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他大吃一惊。他说如果是白人高唱‘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不被认为是公然的纳粹宣传才怪。我当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长期贫穷落后，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所以要这样唱歌激励爱国主义热情。他仍然不以为然。”（丁东、孙珉1996:91）

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不同意见。一位澳大利亚华人便在次年的《读书》上撰文认为：“龙的传人唱‘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与纳粹唱‘蓝眼睛金头发白皮肤’毕竟不是一回事，而且挑出一句歌词而不看整首歌的内容，也有些片面。那位澳洲汉学家不以为然，大概不止是因为他的汉学研究得不够深透吧。”（曾诚1995）

但也有人坚持并发展了王蒙的意见，文化学者程映虹于2011年撰文提出：“种族主义在中国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由于难得和其他肤色的人种大规模交流，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向来淡薄”，但“用‘两黑一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样的“生物学的标准”来定义中国人依然是不合适的。（程映虹2011:66）

我们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面对同样一首歌曲，认识会如此不同。第二，明明我们绝大多数人在传唱《龙的传人》时抒发的只是“华夏儿女的爱国热情和高尚的民族情结”，从来没有想到这是种族主义，那为什么会被海外的部分人士认为是“种族主义”？第三，《龙的传人》爆红于1983年，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汉学家指出这是“种族主义”，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言语行为分析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的共情修辞问题。

2. 共同体的建构与共情修辞的必然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离不开共同的生活，这就形成了所谓“社会”。如果说人类这一共同生活历史上曾经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而分为一个个不同的族群，但随着经济生产的全球化、信息流通的全球化、人口流动的全球化，地球已然成为一个村庄，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经成为

21世纪人类的伟大愿景和伟大实践。

2.1 何为共同体

共同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但“共同体”这一概念的诞生却缘于全球化的推动。“共同体”和“社会”虽然都属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形式,但根据德国思想家滕尼斯的分析,“共同体”是人类出于“本质意志”(Wesenswille)的有机团结,它体现了人类关系的真正本质,而传统意义的“社会”则是依赖权力、制度、法律等“选择意志”(Kfirwille)形成的机械团结,体现的是人类关系的表象。只有“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滕尼斯1999:154)。而在2013年,党中央更明确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2014:272)

“命运共同体”是“命运”与“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精神组合和有机联系。政治学人王泽应(2016:5)认为“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型及其价值要求,同时又是诸种共同体精神和特质的综合化集结和辩证统一,其伦理精义集中体现为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与责任共担。”的确,共同体有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等。不过,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其中的成员,在利益上可能不一致甚至有时冲突,在价值上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常常矛盾,在发展上可能有先后甚至巨大反差、在责任上可能有偏重甚至相当不同,那么,是否还能够构成“命运共同体”?

我们认为,构成一个共同体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情感”,有了情感基础,其他的差异不但容易控制并且更容易趋同,反之,没有情感共同体,就构不成命运共同体。

情感是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最核心的因素,在当今世界,“情感”更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传统的地缘政治学,也发展出了“情感地缘政治学”。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2010:170-171)便指出:“我们生存的这个互相依存、融合一体的世界,真是难以掌握和理解了。这既是数量问题也是质量问题: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数量,如此广泛的分布,而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环境等方面又如此不同。人们很容易无视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因此,激进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将世界的复杂性减低,甚至只剩下口号、标语和僵硬的指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情感是最能让人确信的。……出于这个原因,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感,就变得越发重要了。其他人会日益成为我们多文化社会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的情感边界变得与地理世界一样重要。而且两者不能够进行机械对比。随着时间的流逝,情感地图将变得合理合法而且必要,就像地理上的地图一样。”“情感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

由此,“共情”便成为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一个构成性的要素。

2.2 何为共情

所谓“共情”(empathy),又称为“神入”或“感情移入”。这一概念创于20世纪初,心理学者最初认为“意味着一个人感觉另一个人的痛苦或愉悦,在感受过程中,他体验到这种感觉并觉察到原因,但是仍会意识到我只是‘好像’痛苦或愉悦”(Rogers, 1975:2-10)。有人提出“共情包含的不是对他人活动的直觉,而是想象地重建他

人的感觉体验”(陈晶、史建彪、张建新2007:664)。有人进一步提出:“共情是人类情感经历和社会交互的重要成分,是指通过观看或者想象能够感知、理解他人处境,能对他人的处境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并对导致这种情绪状态的来源有清楚认识的一种能力。”(付迪、戚艳艳、伍海燕、刘勋2017:2500)有人更进一步提出,共情就意味着需要“积极关注”“尊重和温暖”“真诚可信”(钱铭怡1994:33-45)。

不过,整体来看,也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最为经典:共情就是“一种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处境,并理解他人的情感、欲望、思想及活动的能力。”(《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153)亦即,“共情”的要义一是角色的转换,要能够“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处境”;二是不限于理解他人的情感,还包括理解他人的“欲望、思想及活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其情感一定是与其欲望、思想、活动互相渗透的。

“情感是身体实践和语言系统以不同方式发生交接的产物,是这种交接产生的特殊动能。”(金雯2022:47)而当今的研究更进一步提出了“情动”(affect)的概念:“我们那超越肉体、超越机器(more than meat or machine)、有知有觉的肉身,正是我们一切意识、经验、创造和行动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情动理解成一种潜能,它制造出不断增强的感受,让身体准备好行动。”(克什温思卡2022:108)共同体的构建无疑离不开语言,情感的共通更离不开语言,情感是行动的强大动力。西方著名的“巴别塔”传说从另一个层面有力地显示了共享同一个语言符号系统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意义。没有国际通用语,构建全球共同体便会遭遇很大障碍;同样,没有国家通用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会遇到很大障碍。

不过,构建共同体,不仅意味着共享同一套语法和词汇,更意味着需要学会修辞,尤其是“共情修辞”。

2.3 何为共情修辞

何为“共情修辞”?这是修辞学界新近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研究者有李克、甘莅豪、钟新等(李克2021;甘莅豪2021;钟新、蒋贤成2021)。根据李克的定义,“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修辞者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在能力范围之内达成与受众情感的时间同步和类别同向,并能够清楚判断受众和自身情感类型及来源,区分受众和自我表征,随后设定并施行修辞策略,这一修辞运作机制可被称为‘共情修辞’”(李克、朱虹宇2022:112)。

这一定义很有启发,不过,我们以为,要进一步认识什么是“共情修辞”,还需要对于“修辞”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认识。

什么是修辞?修辞学是人类思想史、文明史上最古老的知识系统之一,根据既有文献显示,最早诞生于古希腊。“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西方修辞传统上一直被等同于‘言说的艺术’或者‘说服的艺术’。言说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基本能力,而用说服取代强制与暴力作为协调群体行为的主要手段则是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刘亚猛2018:1)古希腊最伟大修辞学者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讨论了修辞的定义、修辞的分类、修辞手段的分类、修辞发明、修辞风格、言说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对于“什么是修辞”,他明确提出:“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2003:8)。而在现代汉语研究中,对于修辞最具影响力的认识出自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適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2006:3)上述两类定义大致可以涵盖目前国内学界有关修辞研究的大多数范式,但无论哪一种,都难以有效地回应人类语言运用的社会实践。

我们认为:所谓“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假设,可以设定为一种“符号体系”,也可以设定为一种“社会制度”,更可以设定为一种“行为过程”。基于对“语言”假设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所谓修辞学就是基于“语言是人类行为过程的一种”假设而展开的语言学,而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而展开的新修辞学研究。

根据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修辞学,修辞应该重新定义为“一切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过程”,修辞学的根本目标应该设定为“以对话语行为的分析入手,有效地推进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由此,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便是:当代生活中,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人与机构的语言交往如何现代化?而要回答这一核心问题,最有效的核心概念就是:(新)言语行为。相关的工具性范畴“主体类型”“意图结构”“语篇过程”“语境参数”“媒介”“关联度”“行为类型”“案例分析”“规则系统”(构成性规则/策略性规则)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一系列相关的命题如“法律/政治/新闻……言语行为如何分析?”“案例库修辞学何以必要?”“实验修辞学何以展开?”等等也就拥有了理论建构的可能(胡范铸2015)。进而言之,所谓修辞就是:某行为主体在一定的语境中,根据自己的意图,依据一定的规则,建构了一定的语篇,并通过一定的媒介传达给相关的主体,并引发有关联的反应这样一种事件。

根据这一思想,重新定义“共情修辞”,就是:某行为主体在一定的语境中,在同时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处境,并理解他人的情感、欲望、思想及活动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意图,依据一定的规则,建构了一定的语篇,并通过一定的媒介传达给相关的主体,并获得相关方对说话者所传达的情感、欲望、思想及活动的理解,最终彼此达成共情这样一种事件。

在这里,“共情”不仅是“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修辞者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追求,自觉地达成与其他主体的情感沟通。“修辞”,更不仅是“说服”,也不限于“调整语辞”,不限于“词汇的选择、句法的运用、辞格的创造、语体的适应”,不限于“修辞策略”,而是意味着人们运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全部过程。

3. 共同体视域下共情修辞的若干命题

根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的修辞观,重新考察修辞如何推进而非阻碍共同体的构建,便能获得一系列以往被忽略甚至误解的命题。

3.1 共情修辞与“学会倾听”

修辞不仅意味着表达,同时还包括接受,由此,共情修辞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不能只顾自说白话,必须“学会倾听”。既然“言语行为就是人类行为中使用话语完成信息交换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任何“交换”都至少牵涉“给予”和“获得”。这就意味着:

第一,任何言语行为都必须关注接受者的认知与情感:在言语交际中,尤其是在跨文化的交际中,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说,还要看对方如何听。对方听不见的话语、对方听不懂的话语、对方听后在情感上适得其反的话语,都不能说是成功的“共情修辞”。

第二,对接受者的认知与情感的关注必须从学会倾听开始:没有有效的听就一定难有有效的说,我们在说之前,先要学会倾听,听到对方的话语、听清对方的话语、听懂对方话语中的情感模式。

第三,倾听就是为了学会用对方语言与对方交流:学会运用对方的话语去沟通对方,用对方的逻辑去说服对方,用对方的关切去感染对方。比如,在强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有必要关注《福乐智慧》这样一些民族元典,用《福乐智慧》去消解极端主义倾向。

第四,倾听就要认识倾听的对象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完整的主体。在这里,每一个个体同时具有多种身份,每一个机构同时具有多种利益,由此自然形成了众声喧哗。因此,当我们听到合乎我们情感的声音时,也要注意听到与我们情感冲突的声音;当听到与我们冲突的声音时,也要注意与我们合拍的声音。全球舆论场是各种意见纷争的场域,既有某些政客制造出的种种极端性话语,但也不乏比较理性的声音。例如根据我们团队青年学者的研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被视为全球“卓越智库”,不仅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中国形象知识生产。“以2019年12月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布的一千多篇新冠议题报告为语料,借助话语的‘框架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布鲁金斯专家群主流看来:‘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固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但‘信息流行病,对于全球发展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美国的疫情失控在于美国政府自身的应对,不应推诿他人;‘对抗’不符合中美的利益,更不符合全球的利益。对于西方这些较为理性的声音,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以全面把握全球思想市场的走向。”(张虹倩、冷知霖、赵诗篇 2022:119)

第五,倾听就要学会交换故事: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需要“说好中国故事”,但是,要想真正说好中国故事,就必须善于与世界各国交换故事,实现文明互鉴。在受聘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大学客座教授给奥-中系吉尔吉斯斯坦教师的讲演中,胡范铸曾经提出:你们学习研究中文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学会向吉尔吉斯斯坦讲述中国故事,更在于把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讲给中国人听,如果把你们600万人的故事与14亿中国人分享,就可能大大提高你们民族文化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度。

第六,倾听也是一种反省机缘。当听到海外的批评时,我们需要思考,其依据何在,是故意“曲解”还是无心“误解”,如果是“曲解”对于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如果是“误解”我们又该如何行动?同样,在听到海外的赞同声音时,也需要思考,这是一种基于全球发展的立场表达,还是基于利益交换的“语言贿赂”。

3.2 共情修辞与“元主体”

修辞不仅意味着“你/我”的对话,不只是“说话者”与“听话者”二者之间的情感感知和响应,由此,共情修辞的命题之二就是:必须树立完整的“元主体”意识。

既然“言语行为是人类行为中使用话语完成信息交换这样的一个事件”,则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一定的行为主体。在修辞和语用分析中,常常将“主体”“社会身份”“情景角色”混为一谈。我们以为,“社会身份”“情景角色”都是“主体”问题,但并不等于“主体”。在分析言语活动的具体社会角色之前,言语行为“主体”分析首先需要确立“元主体”概念。

什么是“元主体”?元主体就是每一个体都同时具备的主体身份,在每一个言语活动中都必然具备的身份。也就是说张三有李四没有,或这一言语活动中有、那一言语活动中没有的身份不能称为元主体。传统语言理论总以为言语交际等于“你/我”的对话(见图1)。



图1 传统“我/你”对话的言语主体模型

其实不然。在《“言语主体”:语用学一个重要范畴的“日常语言”分析》(胡范铸2009)中,我们已经指出:自然语言的人称系统清晰地指示我们,言语行为是“我/你/他”三方互动的过程。任何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都同时包含了这三种身份。

“我/你/他”,就是由一切人类活动过程中抽象出的参与者身份。这一身体系统就是元主体,也就是关于主体(具体社会身份及其询唤)的主体。这里“言语主体”不仅仅意味着“我”,也应包括“我”的对位“你”,还应包括“他”的存在;“我”是说话者,“你”是听话者,“他”则是监督者;进而言之,“我”不仅仅是I(行为发出者),也是Me(行为接受者),“我”不仅是“主体性”的,也是“主体间性”的(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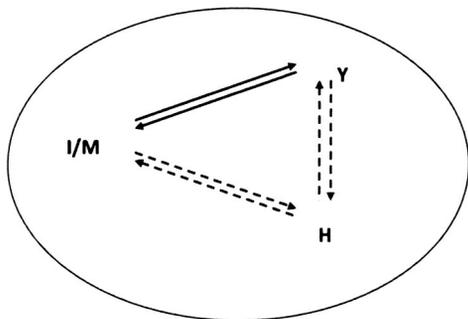


图2 基于人称代词系统的言语主体结构

可以说,有无“他者”(监督者)意识是儿童语言与成人语言、巫术语言与理性语言的根本性区别,是言语行为现代性最深刻的标记。由此,共情修辞所共之情,就不仅仅是“对话者”之情,而是包括“他者(监督者)”在内言语行为各方的情。这就意味着:

第一,内宣外宣行动需要一体:传统的宣传理论总是告诉我们“内外有别”,其实,在数字互联、信息全球流通时代,受众已经很难区分“内/外”,在“内宣”时,海外可能比国内更快收到;同样,在“外宣”时,国内也不可能不同时关注。这就需要抛弃传统的内外分裂的话语模式。我国新闻语言的一个常见问题便是忽视“隔墙有耳”,说给国内听时,没有注意国际上其实都在听着。

第二,直接间接受众需要兼顾:钱钟书《围城》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我发现拍马屁跟谈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咱们以后恭维人起来,得小心旁边没有其他人。”其实不仅说好话如此,政治语言、对外话语中的驳论同样如此,当我们驳斥某一种意见时,不仅是向对方说的,还必须看到整个舆论场都在关注。如果一听到不利声音就以为必须去反驳,立刻进入“互怼”模式,可能既说服不了对方,还同时失去了第三方的理解。

第三,强国弱国受众需要平衡:世界各国有强有弱,我们很多话语,只看到比我们强的国家,却没有注意到比我们弱的国家。例如,我们的媒体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面对强国,可以成为我们自我激励的动力,可是,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比我们弱的国家,他们听见以后将作何感想,这是必须考虑的。

第四,我/你/他声音需要统合:我们倾听到的“听话者”声音越是准确,倾听到的“监督者”声音越是完整,就

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表达自我,更能帮助我们构建自我。

3.3 共情修辞与“话语权补偿”

修辞的话语权与国力高度相关,但绝非国力越强就话语权越大,共情修辞的命题之三就是:在追求和平发展的社会语境中,有些话越是强大越是无权说,或者说不合适说,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话语权补偿”机制。

社会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曾经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话语权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直接相关,越是强者话语权越大。其实这一结论有很大的问题。深入思考,不可一概而论。因为这里不但是话语权问题,还存在一个“话语权补偿”机制问题。

共同体中的各个群体之间在文化上、经济上等有强弱之分。强势群体自然拥有较多的话语权。但既然人类社会不是简单的弱肉强食,那么,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也就不会简单地始终短缺,亦即并非一定时时处于下风,而是完全应该且可能获得某些补偿。这就是话语权的补偿机制。所谓话语权的补偿机制,指的就是某些言语行为只有弱势群体有“权”行使,而强势群体倒是不便或者说不可以行使的。

例如,在社会身份问题上,便存在明显的“话语权补偿”机制。强者通常意味具有可主动攻击他人、控制他人的力量,因此,任何对强者身份的强调,都可能同时意味着“威胁他人”的间接言语行为。而弱势群体缺乏攻击的力量,反而具有易被攻击的可能,对自身特有身份的强调一般不可能成为“威胁他人”的间接行为,更多地倒是应对竞争性语境的一种策略,通过对这种身份的强调,加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克服文化自卑心理,提升应对能力。

现代社会正日益走出“丛林化”,因此,在一个和平共处的社会语境中,强者应该避免发出或至少是避免无意间发出对其他群体的“威胁”。同样,在一个去丛林化的现代语境中,对自我身份的强调通常是弱势群体的特有权利。

话语权的补偿机制是和平发展性语境中的一种群体性交际的潜规则。这种群体可以是民族性的,也可能是其他如女性、儿童、教师等。比如,我们可以有儿童节、教师节、妇女节,但现代社会却不认同“部长节”“总裁节”。强势群体“无权”要节,弱势群体却有权“要”节。这就是这种补偿机制的作用。

这种“话语权补偿”机制的另一表现就是强势群体中的成员为表示对弱势群体的认同,可以借用这种“弱势身份”;而弱势群体如果要表示与强势群体的认同,借用“强势身份”将是不恰当的。例如:

“我是白人,但与非洲足球共舞,我有一颗黑人的心脏。”说这话的,是塞内加尔队主帅梅特苏。

(“我有一颗黑人的心脏——记塞内加尔法国籍主帅梅特苏”,《新民晚报》2002.6.12)

对于这么一段话,无论是法国的白人还是塞内加尔的黑人,估计都不大会感到违和;可是,如果是一位黑人担任白人球队的主帅,采用同样的话语策略,“我是黑人,但与欧洲足球共舞,我有一颗白人的心脏”,则可能在两个方面都受到非议:黑人批评他,白人也不认同他。

回到“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歌词,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强势欧美文化,适当强调中国人的种族和文化身份,曾经是相对劣势的中国人的一种权利。那么,为何1978年《龙的传人》开唱时并没有什么外国人表示看法,直到1990年代开始却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图3。

在《龙的传人》问世的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每天不到一元人民币,可谓相当贫穷。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到王蒙发表文章的1994年,已经增加了整整十倍。可以说中国到1994年已经不那么弱了。而到了程映虹撰文的2011年,我们的收入已经增加了近63倍,这是极其惊人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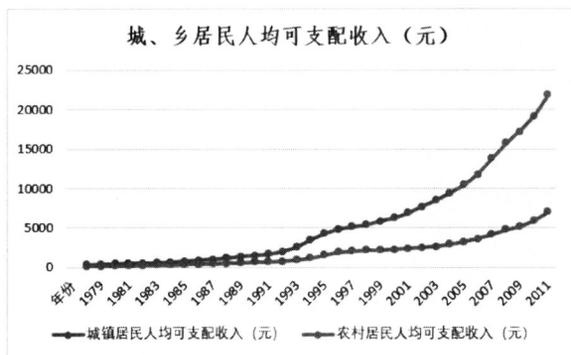


图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们已经确定,在和平发展的语境中,对族群身份的强调是弱势群体的某种“特权”,那么,当我们国力大增后,这一“权利”自然也就开始转化。由于强者身份容易使他人感受到某种压力、不确定性,这时,我们再强调“黑头发”也就开始容易唤起他人的某种不安全感。

越是强大越是不便过于强调自己的身份,越是强大越是不便过于强调自己的强大。今天,中国已经发展为GDP总量世界第二,我们已经有能力给别人造成不安全感,此时,我们当然就必须注意降低被人误解为“威胁弱小”的可能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尤其需要特别小心。

3.4 共情修辞与“共同体化”

人类“共同生活”形成“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语言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化最重要的工具,而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化迄今最高级的形式,因此,共情修辞的命题之四就是:共情不只是一种修辞策略,而是人类推进“共同体化”、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以外语教育为例,语言学习不仅是一个认知发展过程,也是一种情感过程,情感不但直接制约语言学习效果,甚至也是语言学习的目的之一。

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第二语言学习的“情感过滤假说”(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如果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动机高、自信心强、焦虑感适度,“情感过滤”就弱,反之,则“情感过滤”就强。对于同样的语言输入,如果“情感过滤”过强,就会导致输入受阻;如果“情感过滤”降低,就容易为大脑所吸收,并内化为语言能力。其实,情感不仅是语言知识输入的“过滤”装置,更是一种“催化”装置。正向的情感强化可以极大地催化二语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学习者对目的语本身的“语言情感”、对目的语社会的“文化情感”、对目的语交际对象的“对话者情感”等都可能成为催化物。

进而言之,“情感”不仅是二语教学的条件,同时也是二语教学的目标之一。21世纪的二语教育,不但是—种知识的教育,更是一种“理解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国际理解教育”的一种。因此,无论是外语教师还是中文国际教育教师,在课堂教学、教材编写中,不但需要关注学习者的语言情感、文化情感,乃

至对话者情感,还应该思考如何将二语的教与学转化为同时构建跨语言的“情感共同体”的过程(胡亦名、胡范铸 2022)。

我们曾经提出:现代政治(已然)是为了某个群体利益的行动,更(应然)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非零和博弈(胡范铸、胡亦名 2021)。有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更多的只是一种期盼,那么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正在日益成为现实。这个“道”就是全人类和平发展之道。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思维”,不断走出“弱者心态”,走出“暴发户心态”,坚决践行“共情修辞”,向着“情感共同体”这一诗和远方不断接近。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社会化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愿景和实践,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媒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离不开语言。“语言”不仅意味着一种符号体系,更意味着一种言语行为,一切言语行为都是修辞行为,不仅意味着日常的行为,更意味着一种社会的实践。共情是达成人类共同体的构成性要素,共情修辞就是充分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处境,并理解他人的情感、欲望、思想及活动的修辞过程,在这里,共情不仅是修辞的动力,也是修辞的一套行动方案,更是修辞的根本目标,对于国家形象修辞而言,更是达成“共同体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Rogers, C. R. Empathic: An Unappreciated Way of Being[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975, 5(2): 2-10.
- [2] 爱地人. 龙的传人: 中华民族的现代“族歌”[EB/OL]. 网易娱乐, <https://www.163.com/ent/article/5HNSC9M300033JIG.html>, 2009-08-27.
- [3] 陈晶, 史占彪, 张建新. 共情概念的演变[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6): 664-667.
- [4]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5] 程映虹. 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J]. *文化纵横*, 2011, (2): 66-71.
- [6] 多米尼克·莫伊西. 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M]. 姚芸竹(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 [7] 付迪, 戚艳艳, 伍海燕, 刘勋. 共情与反共情的整合机制[J]. *科学通报*, 2017, (22): 2500-2508.
- [8] 甘莅豪. 从狂欢到共情: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家形象修辞——一种体育景观观念史的视角[J]. *文化艺术研究*, 2021, (5): 21-31.
- [9] 胡范铸. 幽默语言、谎言、法律语言、机构形象修辞、实验修辞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思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 1-9.
- [10] 胡范铸. “言语主体”: 语用学一个重要范畴的“日常语言”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6): 66-72.
- [11] 胡范铸, 胡亦名. 政治传播语言学的逻辑起点[J]. *社会科学*, 2021, (1): 17-26.
- [12] 胡亦名, 胡范铸. “接引语”: 一个与中介语对应的二语教师语言分析模型[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 (2): 117-129.
- [13] 金雯. 情动与情感: 文学情感研究及其方法论启示[J]. *文化艺术研究*, 2022, (1): 44-55.
- [14] 李克. 共情修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28(2): 144-145.
- [15] 李克, 朱虹宇. 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4(2): 110-118+176.
- [16]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 [17]钱铭怡.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18]璩静. 十部委开展全国“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EB/OL]. (2009-05-25)[2022-08-13]. http://www.gov.cn/govweb/jyzg/2009-05/25/content_1324074.htm.
- [19]谭雅·克什温思卡. 韩真真(译). 游戏于恐惧: 生存恐怖游戏的表征、规范和情动[J]. 文化艺术研究, 2022, (4): 108-110.
- [20]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1]王蒙. “头朝下”漫议[C]//丁东, 孙珉. 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
- [22]王泽应. 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5): 5-15.
- [2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4]亚里士多德. 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M]. 颜一、崔延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5]曾诚. 关于 political correctness[J]. 读书, 1995(2): 7.
- [26]张虹倩, 冷知霖, 赵诗篇. 众声喧哗中全球智库的疫情话语——基于布鲁金斯报告的框架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 119-129.
- [2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 [28]钟新, 蒋贤成. 共情修辞视域下习近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话语实践分析[J]. 对外传播, 2021, (2): 20-23.

Goals, Problems and Paths of "Rhetoric of Empath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n the Concepts of "Meta-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the Other" and "Discourse Right Compensation"

Hu Fanzhu Zhang Hongqian Hu Yimi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greatest vision and practice of human socialization.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dium of human interaction, and it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Language" here does not only mean a symbolic system, but also a rhetorical act, a kind of "rhetoric of empathy". According to the "New Speech Act Analysis" theory, rhetoric not only means "expression", but also "recep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empathy should have a conscious sense of "listening". Rhetoric not only means the dialogue of "you/I", but also the emotional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of "I/you/other", and the rhetoric of empathy should have a conscious sense of "otherness". Rhetoric not only means the realization of discourse right, but also the mechanism of "discourse right compensa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empathy should consciously get out of the "jungle thinking". Furthermore, empathy is not only the driving force of rhetoric, but also a set of action plans for rhetoric, and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rhetoric. For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image, empathy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communal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rhetoric of empathy; new speech act analysis; meta-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the other; discourse right compensation; communalization